

正校讎之名，考學術之源 ——張舜徽《廣校讎略》的貢獻之一

JIAOCHOU Studied to Put Ancient Documents in Order, the Source
and Flowing Used for Taking an Exam of the Academy

李華斌
Hua-bin Li

湖北大學古籍所 2003 級研究生

【摘要 Abstract】

《廣校讎略》是張舜徽先生四十年代寫的關於校讎學理論的一部文獻學著作，它與中國《古代史籍校讀法》、《中國文獻學》、《文獻學論著輯要》構成文獻學系列。《廣校讎略》是張舜徽先生文獻學理論甚至學術史的一個大綱，雖然以條列的形式，比較細碎，但它從整體的、宏觀的角度考辨文獻學的源與流的關係；同時又廣徵博考，絕識曠論，有考索之功、獨斷之學。張舜徽先生為博通的文獻考據學者，在《廣校讎略》中首正校讎學之名，為中國古代文獻學正本清源，也得到一些同輩學人的理解、默認、乃至贊同。

GUANG JIAO CHOU LUE that Mr. Zhang wrote in 1940s is about the theory of the Bibliography. Although the content is a bit miscellaneous, it takes an exam of the source and flowing that distinguishes documents in terms of the whole and macroscopic. Mr. Zhang who is a coherent document textual criticism scholar thinks JIAOCHOU studied to put ancient documents in order, which get some scholars understanding, acquiescence and support.

【關鍵詞 Keywords】：

校讎學；目錄學；文獻學；張舜徽；劉向；鄭樵；章學誠

JIAOCHOUXUE, Bibliography; Zhang ShunHui; Liu Xiang; Zheng Qiao; Zhang XueCheng

壹、正校讎之名

《廣校讎略》卷一《校讎學名義及封域論》：「近世學者於審定書籍，約分三途：奉正史藝文、經籍志及私家簿錄數部，號為目錄之學；強記宋、元行格，斷斷於刻印早晚，號為版本之學；羅致副本，汲汲於考訂文字異同，號為校勘之學。然揆之古初，實不然也。蓋三者俱校讎之事，必相輔為用，其效始著；否則析之愈精，逃之愈巧，亦無貴乎斯役矣。」張舜徽先生首先從考辨我國文獻整理的源頭出發，認為目錄、版本、校勘都是校讎的一部分，它們三者相輔相成，不能脫離校讎這一整體，單獨分析研究它們；然後引用黃宗羲的名言「析之者愈精，逃之者愈巧」，然後指出治學的道不能太過狹窄、專精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他，以至在著述中摻入許多曲說和空虛不實之辭。張舜徽先生希望學者治學走博通之路，由博返約，故為「校讎學」正名。《廣校讎略》大約寫在四十年代初，那時雖已出現了文獻學的概念，但大多數人們還沒接受，人們通常仍在使用校讎學與目錄學的概念：關於校讎學與目錄學的爭辯還沒達成統一認識。張舜徽正校讎學之名，絕識曠論，有摧陷廓清之功。

貳、「析之愈精，逃之愈巧」

這是黃宗羲在《留別海昌同學序》說過的話，他認為把儒分為儒林、文苑、理學、心學，析之極精，而理學、心學不過是讀經生之章句，窮字義之從違，文與學、學術與事功不能離而為二，而應合二為一。黃氏主於貫通經史，以經世致用為歸，是一位有規模氣象、有才略膽識的大學者。張舜徽先生認為他對心學、理學的批評原則，也適用於一切學術包括文獻學的批評。自鄭樵、章學誠以校讎學定義後，學者們對校讎學與目錄學的關係一直爭論不休，一些只專精目錄或版本或校勘的學者，沒有有容乃大的氣度，未免有「析之愈精，逃之愈巧」之嫌。

鄭樵《校讎略》談論的是文獻整理、收

集、分類、編目等，卻不以目錄命名。清章學誠在宗鄭的同時，正式提出「校讎學」的概念，在《信摭》中說：「校讎之學，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，最為推見古人大體，而校訂字句，則其小焉者也。絕學不傳，千載而後，鄭樵始有窺見，特著校讎之略，而未盡其奧，人亦無由知之，世之論校讎者，惟爭辯於行墨之間，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。」它指出校讎學的源與流，闡明了它與校勘的關係。章學誠批判繼承鄭樵的同時，認為考辨古書的「篇卷參差，敘列同異」只是校讎學的一部分，否認把當時學者稱之為的「目錄學」當作校讎學，有時還用卑視的口吻稱之為「甲乙著錄」或「僅記部目者」。例如《校讎通義·互著篇》三之一：「古人著錄，不徒為甲乙部次計。如徒為甲乙部次計，則一掌故令史足矣，何用父子世業，閱年二紀，僅乃卒業乎？」又在《補校漢藝文志篇》十之三：「《漢志》最重學術源流，似有得於太史《敘傳》，及莊周《天下篇》、荀卿《非十二子》之意。此敘述著錄，所以有關明道之要，而非後世僅記部目者之所及也。」鄭樵、章學誠都是學識淵博的學者，在治學上有圓通廣大的氣象，他們提出開闢發校讎學概念的內涵與外延，雖疏於考證，在校讎學的理論構建還不夠完善，然「識」高於眾人，深得張舜徽的讚賞。

「目錄」之名首提者為劉向，例如《漢志·敘傳》云：「劉向司籍，九流以別，爰著目錄，略敘洪烈。」用目錄二字聯繫到一種專門學問，稱為「目錄學」，卻是從宋人開始的。《蘇魏公譚訓》卷四說：「祖父謁王原叔，因論政事。仲至侍側，原叔令檢書史，指之曰：此兒有目錄之學。」（張舜徽在《廣校讎略》卷一改正了姚名達的《目錄學》認為目錄學始見於王鳴盛《十七史商榷》的錯誤）把目錄學作為一種學問，並闡明它的作用是乾嘉時期比章學誠稍早的王鳴盛，例如王鳴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一：「目錄之學，學中第一緊要事，必從此問途，方能得其門而入。」卷七又說：「凡讀書最切要者，目錄之學。目錄明，方可

讀書：不明，終是亂讀。」比章學誠稍後的黃丕烈、顧千里、龔自珍等，都奉正史藝文志、經籍志及私家簿錄數部，也把我國古代文獻整理的實踐正名為「目錄學」（註1）。更有甚者。例如《廣校讎略》卷一說：清李兆洛在為顧廣圻修墓誌銘時，謂《通志·校讎略》「惟言類例，無涉校讎」，尖銳地抨擊鄭樵以校讎來命名。這些乾嘉時期考據學者，通儒少，專家多，大都把目錄只當作藝文志、經籍志、私家簿錄，故他們考證雖精，但只局限在類例、目錄方面，「識」未免有些不高。

又有學者為調和這種矛盾，折衷提出「校讎目錄學」或「目錄校讎學」。例如清末學者朱一新在《無邪堂答問》卷二曰：「劉中壘父子成《七略》一書，為後世校讎之祖。班志攝其精要，以著於篇後。惟漁仲、實齋能窺斯旨，商榷學術，洞徹源流，不惟九流諸子各有精義，即詞賦方技亦復小道可觀。目錄校讎之學所以可貴，非專以審訂文字為校讎，而校讎之途隘；以甲乙簿為目錄，而目錄之學轉為無用。多識書名，辨明版本，一書賈優為之，何待學者乎？」他澄清了人們對校讎學、目錄學的誤解，而把校讎學與目錄學並列，提出目錄校讎學的概念。近代乃至現代有很多學者把它正名為校讎目錄學。例如蔣伯潛的《校讎目錄學纂要》就把校讎學與目錄學分為兩支，合在一書中闡述，「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」。

五四以後，隨著西方思潮的傳入，學科愈分愈細，學問也越做越精，目錄學作為一門學科正式興起了，校讎學與目錄學的關係又引起一批學者的爭議。例如：(1)余嘉錫先生《目錄學發微》中「論目錄學的意義及其功用」時說：「案據應劭《風俗通》引劉向《別錄》，釋校讎之義，言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。則校讎正是審訂文字，漁仲、實齋著書記目錄之學，而目為校讎，命名已誤，朱氏（朱一新）之說非也。特目錄不專是校讎、版本耳。」余氏は輔仁大學的教授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，也是張舜徽的四姑父，張舜徽先生青年時期有一段時間生活在余先生家裡，作為長輩、學者，余嘉

錫的目錄學思想對他的治學多有影響，這些可從《廣校讎略》中找到證據，但兩人關於文獻學的一些基本觀點是不相同的。《目錄學發微》是目錄學的重要著述，余氏認為校讎就是審訂文字，即校勘；目錄學應包括校讎、版本、目錄等。(2)著名的愛國目錄學家姚名達先生在《中國目錄學史》中說，「目錄二字不可抹殺。」在分析向歆的校書過程中，他認為劉向的校書工作為校讎，劉歆的編目工作結果為目錄。為了辨明目錄學的意義，確立目錄學的學科地位，姚名達分析了目錄學與其他諸多學科的關係，認為校讎學、圖書館學、書志學是目錄學的基本知識。姚氏雖然認同校讎學，但與余氏一樣，承認廣義的目錄學，認為校讎是目錄學的組成部分。

高舉目錄學大旗的一些學者治學領域主要局限在目錄學，他們精於對古書的體例、目錄學史考辨，缺少圓通廣大的氣象，難免有「析之愈精，逃之愈巧」之嫌。

參、考辨學術之源

要給我國古代文獻整理實踐的這門學科正名，還必須正本溯源。我國古代的文獻整理活動，起源很早。自從有文字、書契以後，文獻的典藏開始是「官守」的，甲骨卜辭、金石文字也是如此。這些典藏的文獻貯存先要分類，例如董作賓在安陽小屯的殷墟甲骨文36坑中發現有一甲，尾尖有冊之文，稍上有孔，以為是「冊六」，猶之卷六，其孔是用來貫書編冊的。西周時文獻的典藏是按官守來分類的，例如《校讎通義·原道》第二：「《易》掌太卜，《書》藏外史，《禮》在宗伯，《樂》隸司樂，《詩》領於太師，《春秋》存乎國史。」它們是「周官之舊典」，「官守其書」，從而形成以「官守」為部類的自然分類表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正是按照這一傳統來給文獻分類的，除輯略外，分為六類，暗合《周禮》六官。

這些官守的舊典由於存放時間較長，多有脫漏、闕疑的文字，需要巫、祝、史等有關人員校理。從現有的文獻材料看，最早的校書工

作出現在西周宣王時，例如《國語·魯語下》：「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。」讎，從字型上推知，表兩只鳥相對，有兩兩相對、兩兩相應之義。「讎」與校書工作有關，最早文字材料出現劉向的《別錄》：「一人讀書校其上下，得其謬誤為校：一人持本，一人讀書，若怨家相對，故曰讎也。」由此可知古代校書工作已由單一、零散的活動走向正式、以二人為單位的文獻整理實踐了。從劉向對校讎的解釋看，「本」與「書」是不同，在校書之前，須選定版本，一人持「本」，「本」為選定之底本：一人讀「書」，「書」為底本的以外的異本。古代文獻整理活動，先是分類典藏、選定版本，然後才校其訛誤後，給文獻材料編目。劉向「條其篇目」，「撮其旨意」，「錄而奏之」，就成了《別錄》。《別錄》、《七略》、《漢書·藝文志》都是西漢河平時期這次文獻整理的成果。以後的正史藝文志、經籍志、私家簿錄等目錄也都應該是某一時期官府或個人文獻整理的成果。而從整個文獻整理的活動看，是不能以目錄來統攝的，而劉向是以「校讎」來概括這次文獻整理活動，人們習慣也稱之為校書，即校讎。在文獻整理過程中，先集底本，而一書底版本往往不只一種，於是有研究「版本」的工作：古書多已亡佚，但類書或他種書籍的底本文注解中引及者，倘能搜輯，或可恢復原書之一部，於是有「輯佚」的工作：古書真偽不一，治書者當更進一步，辨別全書或其一部分的贗品，於是有「辨偽」的工作。故校讎的概念不能只從字面上的意思理解，而應根據人們的習慣和古代文獻整理的歷史過程來限定，不能把校讎等同於校勘。

校、讎連用時一般作「讎校」。例如《後漢書·和熹鄧皇后紀》載劉珍等人「詣東觀讎校傳記」，晉左思《魏都賦》：「讎校篆籀，篇章畢覲。」南宋時，也常稱「讎校」，例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八，陳振孫對晁公武所撰提要評論時說：「其守榮州，日夕讎校，每終篇，輒記大旨……其所發明，有足觀者。」以上所舉，讎校是指具體的文獻整理實踐。對古

代讎校活動最早作理論探索的是南宋的鄭樵，他的《通志·校讎略》對校讎學的理論「始有窺見」，而「未見其奧」，繼鄭樵之後，清章學誠的文史校讎理論是對校讎學深入研究，他的校讎學專著是為續《通志·校讎略》，稱為《校讎通義》。清末范希曾《校讎雜述》說：「細辨乎一字之微，廣極夫古今內外。載籍浩瀚，其事以校勘始，以分類終，明其體用，得其輿理，斯稱『校讎學』。」由上可知，蓋始有校讎之事，繼有校讎之名，終有校讎之學。

南宋的鄭樵、清代的章學誠都被人們視為重要的目錄學家，因為鄭樵的《校讎略》重點談了「編次必謹類例論」、「編目必記亡書論」、「編書不明分類論」、「編次之訛論」、「編次有序論」等有關目錄學的方法、理論：章學誠的《校讎通義》也詳細論述了「互著」、「別裁」、「辨嫌名」等目錄學的思想。然鄭氏《校讎略》也涉及到文獻的收集、散佚以及編目人才的培養，章氏《校讎通義》也重點闡述了「原道」、「宗劉」有關學術源流以及「採輯補綴」、「書掌於官」等文獻的典藏問題；故他們都不以「目錄」命名。張舜徽先生是二十世紀後半期的「國學大師」，「無愧為有學問的通人」，「似乎只有劉詒徵、錢穆等少數人才夠得上，『國學大師』」（註2）。和鄭樵、章學誠一樣，張舜徽先生主張通學，是位博通之人，以宏觀的、整體的視角來考辨古代文獻整理的源與流的關係，故在《廣校讎略》中贊成章學誠的說法，認為目錄不能自成為「學」；但學校讎，足以包括無餘。後來又在《中國文獻學》中更進一步闡明：「對目錄的討論，絕不可侷限於死記每書的篇目和行款，一定要從學術源流和著書體例方面理解問題，更不要將目錄從校讎學範疇裡分割出來，別成所謂的『目錄學』。只有從校讎學的角度去看目錄，才能體現出它在『辨章學術，考鏡流源』方面所起的作用。」

肆、迴避爭論，彌補門戶之嫌

隨著書籍日多，學問越做越細，目錄學就

漸漸脫離校讎學這一母體漸漸獨立了，然目錄學不能包括校讎學，代替校讎學，那種把古代文獻整理稱之為目錄學的人，未免有本末倒置的嫌疑。張舜徽在《廣校讎略》中不承認目錄學，未免有門戶之嫌，但先生反對脫離整體去談局部，而應以辨證的觀點去看部分在整體中的作用，不承認「目錄學」也是有道理的。張先生一生力破門戶之見以辨學識之得失，體現在他的清代學術研究中，在《清人筆記條辨》、《清儒學記》中，對漢學、宋學的爭端，對門戶之見的著名學者桐城派的領袖方苞、《漢學商兌》的方東樹、首先標舉漢學之名的惠棟、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的江藩等，批評他們拘泥固守、偏執門戶，甚至對自己仰慕且極力推揚的章學誠對汪中、袁枚的攻擊甚至漫罵醜詆，張舜徽先生吹灰拭塵，為他們辯誣。張舜徽先生認為「學術乃天下之公器，且不是少數人所能壟斷的」（註3），如二十世紀七、八十年

代開始使用鄭鶴春、鄭鶴聲兄弟三十年代初提出的文獻學概念，迴避了廣義或狹義校讎學與狹義或廣義目錄學的爭論，從某種程度上彌補門戶之嫌。例如他在《論宋代學者治學的廣闊規模及替後世學術界所開闢的新途徑》中丁《簿錄群書的工作》說：「宋代最傑出的目錄學家，首推鄭樵。」這一旁證說明張舜徽就已經承認目錄學家，當然就承認目錄學了。

總之，張舜徽先生為校讎學正名，也是為文獻整理正本清源，得到了一些同輩學人的贊同，例如二十世紀下半葉，人們已經廣泛地接受並使用「文獻學」的概念，張舜徽先生也在七十年代末發起並成立中國歷史文獻學會，擔任學會會長，編成《文獻學論著輯要》，撰寫了《中國文獻學》；而程千帆先生把自己所寫的九十年代出版宏篇巨著仍稱之為《校讎廣義》，它分版本、校勘、目錄、典藏四篇，繼續沿用廣義校讎學的概念。

【附註】

註1：李萬健、賴茂生《目錄學論文選》（M）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版中的王重民的《論章學誠的目錄學》

註2：蔡尚思1994年2月18日在香港《大公報》發表《通人張舜徽先生》

註3：張舜徽《認庵學術講論稿》（M）岳麓書社1992年

